

专门史学术文粹



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

(1903—1928)

The Organization Network of
Tientsin Chamber of Commerce (1903—1928)

应莉雅◎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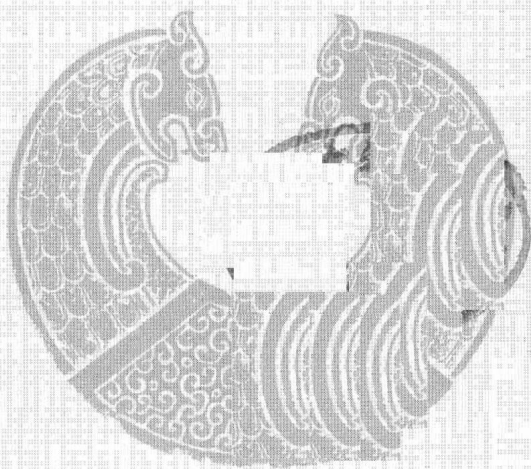
专门史学术文粹

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

(1903—1928)

The Organization Network of
Tientsin Chamber of Commerce (1903—1928)

应莉雅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1903—1928/应莉雅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7

(专门史学术文粹)

ISBN 7-5615-2624-5

I. 天… II. 应… III. 商会—研究—天津市—1903—1928
IV. F72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6883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75 插页:2

字数:310千字

定价:3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探讨近代天津商会组织网络与区域市场经济变迁的互动关系,力求把当代富有影响的几种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应用于研究对象的考察,从交易成本和博弈论的角度提出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市场功能是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矛盾统一,尝试为交易成本理论提供一个经验性范例,也为研究近代商会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方法。

本书依次从三个层面上展开讨论:一是从区域经济和社会网络的视角剖析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层次结构及其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运行机制,阐述近代区域市场在整合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对天津商会组织网络构建的决定性影响;二是根据市场缺陷理论分析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性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和博弈论解释天津商会组织网络在区域市场的经济功能;三是把结构化理论的结构二重性学说当作工具,探究天津商会组织网络与区域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时空场景下的互动关系。

天津商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制度化的组织网络,它既是区域市场经济变迁的结果,又是影响区域市场向近代转型的重要因素;天津商会组织网络作为一种非市场组织,它的市场功能是减少区域市场交易成本;天津商会组织网络与区域市场经济变迁的历史性互动体现

出结构二重性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天津商会组织网络自产生以后就成为区域市场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和资源，另一方面天津商会组织网络所具有的制度化结构和实践对区域市场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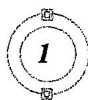
序 一

郑学檬

应莉雅博士的学位论文即将付梓,请我写一篇序,因为我读过这篇文稿,且有三年同事经历,所以没有不响应的理由,欣然同意了。

经济史研究的范围、内容、方法已今非昔比。但是,不管何种经济史著作,它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回答某个时段和空间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并回答人们所期望回答的问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的“序”中说: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将“现代”的意义等同于当代世界,而把过去托付给“传统”,把将来交给“后现代”。就是说,过去的“传统”中有现代意义的东西。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看到本书的现代意义。

近代商会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商人组织,既区别于传统的地域性会馆,也区别于传统的行业性行会。中国的近代商会最早出现在上海等通商城市。天津商会是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之后。作者说:天津“商人们看到了商会、跨国公司这类组织在联络商人、壮大经营实力中发挥的巨大整合作用”,于是发起成立商会。商会的作用直接表现在促进市场的拓展,以求“商务之大转机”。拓展市场正



序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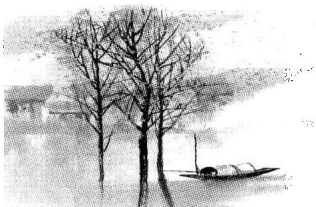
是近代经济市场化的一个过程,也就是现代化的一个表现。

作者运用目前颇为流行的市场网络理论,来分析天津商会多层次组织网络,使商会在近代化中的催化作用变得十分形象和具体。正如作者所写道:商会成员的实践“对区域商品市场由传统向近代的过渡、整合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当然,市场的魔力不止于组织网络,市场既然负有配置社会资源的神圣使命,那么,它就有对商品、资本等一切资源的支配与导流的能力。在疏通商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同时,必然“对区域资本市场的整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通过层次的逻辑的分析,本书作者把我们带入一个广阔的近代化的时光隧道。“万物有形皆有著,白云有形无系缚。”(唐朝诗僧皎然《白云歌》的诗句)市场对人们来说,似乎也有白云般的感觉,有形而无法捉摸。但在应莉雅博士的书 中,透过对天津商会的研究,令我们有实在的感知,也就是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近代化的课程。“此中灵秀众所知”,我亦短序为之歌。我相信,执著于现代化的中国读者,对于本书是会热忱关注的。

谨此为序。

于厦大东区寓所“点涛斋”

2006年6月15日





序 二

戴一峰

众所周知,20 世纪 80 年代初,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我国史学界迎来了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中国近代商会研究,就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朵。虽然早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国外就有少数学者关注中国近代商会,但这一研究领域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异地崛起、进展神速,且得以充分、深入展开,无疑应归功于章开沅等老一辈学者独具慧眼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在短短 10 余年间,苏州、天津、上海等地的商会档案资料被陆续开发、整理出来,一批学术视觉敏锐、英气勃发的中青年学者,尤其是章老的几位得意门生,驰骋于这一研究领域,陆续推出一批颇显功力的学术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我由于从 90 年代初开始,研究兴趣由近代中国海关转向近代海外华商及其跨国网络,先后参加了几次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对国内迅速推进的商会研究自然格外关注,并希望在加大这一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的基础上,拓宽其研究视野。1998 年 4 月间,在新加坡参加“亚洲商业网络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曾和滨下武志、刘宏等国外学者讨论了相关问题。当时刘宏正倾心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研究。2000 年



序
二

8月间,在武当山举行的“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终于见到了神交已久的、中国近代商会研究的主流代表马敏、朱英等人,和他们交流了商会研究的相关信息,探讨了深化研究的走向和途径。在这次会上,我还见到了长期潜心于天津商会档案整理和研究的胡光明、宋美云等几位学者,就天津商会档案的开发、利用以及相关研究相谈甚欢。一个月后,在北京举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又和上述几位中国近代商会研究领域里的干将会面,再次讨论了商会研究的问题。我还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向宋美云约了一篇讨论天津商会网络的稿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2002年初应莉雅和我讨论她的博士论文选题,表示她对商会组织网络问题很感兴趣时,我便建议她充分利用已经整理出版的1000多万字的天津商会档案,从事天津商会研究,并希望她能以区域社会经济和社会网络的视角来解读天津商会组织。应莉雅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此时,我却不免有些担虑。因为我知道,在经过20多年来诸多学者的辛勤耕耘之后,中国近代商会这片研究领域已经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要想取得创新性成果,实属不易。我忐忑不安地关注着应莉雅论文的进展。直到她把初稿呈现在我面前,我才释然了。经过几番修改,应莉雅顺利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并在答辩会上获得一致好评。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她的博士论文修改稿。

纵观20余年来的近代中国商会研究,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它阶段性发展的足迹。不仅研究视野在考察对象的空间和时间上不断伸延,使各种不同地域、不同规模与等级、不





同类型的商会组织,及其不同时期的活动相继进入研究范畴,而且关注的问题也由表及里,由窄变宽,从起始作为对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的延伸,更多关注商会的历史沿革与性质,到关注商会的政治活动及与政府的关系,再到关注商会的社会和经济功能。与此同时,结构主义、现代化理论、系统论、市民社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社会网络理论等各种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也被相继运用。但整体而言,研究群体主流的目光仍然落在国家建构的宏大叙事上,偏重于探索商会的政治活动与政治功能。对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关注不够,研究成果偏弱。尤其是缺乏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角度,探讨作为非市场经济组织的区域性商会在社会经济层面上的性质与功能,以及区域性商会与区域社会经济两者间密切的互动关系。这正是本书要弥补的缺憾。

本书在认真而详尽检讨以往,尤其是近20余年来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商会研究的主要成果的基础上——这可以从本书用功扎实的学术史回顾见之——力图运用新经济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学术前沿理论,探讨天津商会组织网络与区域市场经济变迁的内在关系。全书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组成:(1)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结构与运作;(2)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性质与功能;(3)天津商会组织网络与区域市场经济的互动。在本书的结论中,读者可以清楚看到作者对这三个问题所作的深入思考、演绎与剖析。

史论的有机结合,是本书一个突出的特点。许多研究生经常困惑于理论与史料解读的脱钩。不知如何运用所学

的理论知识来分析和驾驭史料。每逢学生问我,我总是向他们推介吴承明老先生的经典名言:“一切理论都是方法。”并鼓励他们多读吴老的论著。按我的理解,吴老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一切理论都只是提供某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应当作为工具使用。要熟练运用工具,而不是被工具所累甚至成了工具的奴隶,首要的条件自然是对工具的结构、性能,以及操作程序和要点的准确把握。换言之,即应当准确领会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视角、思路和精神。否则的话,仅仅是抓住了理论的皮毛,记住了一堆新奇的概念,结果只能是在自己的研究中生搬硬套,给论文戴帽穿鞋。本书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样本。

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在本书的第三章,作者娴熟地糅合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市场缺陷理论和科斯创立的交易成本理论,步步递进、层层深入地剖析了作为一种非市场经济组织,天津商会组织网络是如何发挥其减少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功能。与以往学术界大多笼统肯定商会具有减少交易成本作用的流行说法不同,作者立足于详实的史料,细心检讨了以天津为中心的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实况,并对交易成本的构成做了科学分类。据此,作者详细分析了天津商会组织网络在区域市场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富有创意地提出:天津商会组织网络减少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经济功能具有两重性:即确定性和非确定性。在这里,史论的结合是成功的。作者不仅由此推进了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而且在实证研究中丰富了相关理论。在本书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如运用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和吉登斯





的二重性结构理论来分析天津商会组织网络与区域市场经济间的互动关系等等。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囿旧说、勇于创新是本书的又一特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广为流传的一句古训。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名后学，能不盲目迷信前人的学术观点和见解，勇于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作出自己的学术判断，已属难得；如若这位前人又恰好是自己的老师，那就更难能可贵了。但学术的进步恰恰最需要这种勇气和境界。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学生能提出与我不同的学术见解。应莉雅自称她的博士论文（即本书）的撰写，是受到我的一篇题名为《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的启发。但事实上，她的研究并没有囿于我在那篇论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在那篇论文中，我有如下一段论述：

首先，如果说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是建构在华商人际关系网络的基础上，那么，这一建构在很大层面上是以各种华商组织为中介，才得以完成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相关联系图示如下：

（实态）华商跨国网络：贸易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等各种网络形态

↑
（中介）华商组织网络：血缘组织、地缘组织、业缘组织、近代商会等各种组织形式

↑
（基础）人际关系网络：同族、同乡、同行、同学等各种人际关系

其次，各种商人组织所构成的组织网络，还促使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的运作规范化、制度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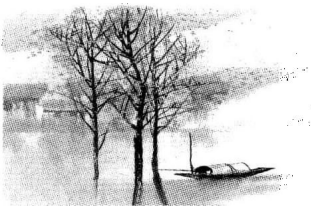
我的这段论述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华商组织网络是其人际关系网络 and 实际经济活动网络的中介；第二，商人组织

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1903—1928)

6

网络具有促使华商网络规范化、制度化的功能。应莉雅没有因袭我的说法,她根据自己对天津商会史料的解读,别具匠心地把社会网络区分为建立在感情关系上、由个体联结的非制度化社会网络和建立在组织规范关系上、由组织联结的制度化社会网络两大类,并将天津商会组织网络归入第二类,作为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两个基本特征之一。进而论证了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天津商会组织网络具有多层次结构,即作为核心的天津商会总会、作为外围首层的分布在以天津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华北各地的商务分会、作为外围第二层的跨区域的全国各地商会,以及最外围一层的跨国的海外各地商会。尽管这一论述忽视了两类社会网络之间的交叉和联系,这种交叉和联系在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运行中是常常显现的,但是这一理论尝试很有新意,也很有学术价值。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知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结构,从而得以进一步认知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运行机制、性质与功能,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丰富了流行的网络理论。

多年来,学术界持续不断地讨论着理论的本土化问题。议论纷起、见仁见智。我以为,倘若我们认同任何理论均只是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那么,正如工具的创造唯有两个途径——自己根据需要创造,或在使用外来工具时根据需要改造——一样,理论的本土化也唯有两个途径:一是在研究实践中提炼出自己的一套完整理论;一是在运用国外前沿理论的同时,补充、修订和丰富它。当然,任何知识成果都具有承继性。理论不会凭空突起。即便是前述的第一条途径,也需要有借鉴和参照。在这个意义上,本书





在理论方面的探索是很值得肯定的。

应莉雅于2001年开始跟随我攻读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此前,她攻读了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打下了较宽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这为她博士生阶段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攻博三年里,她刻苦认真、勤勉用功,因此方有本书的问世。作为她的导师,对她提出的为本书撰写序言的要求自然义不容辞。唯因本书涉及的问题也是我自己多年来关注和孜孜探索的,积累了些许的思考和体会,故利用这一机会,借题发挥,多有啰嗦之处。

是为序。

2006年5月19日





目 录

序 一	郑学檬
序 二	戴一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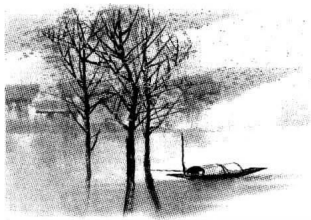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导 论	(1)
一、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历程	(1)
二、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问题评述	(12)
三、天津商会研究的状况	(26)
四、本书的选题与构架	(32)

第二章 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结构与运行	(35)
第一节 天津商会的产生	(36)
第二节 天津商会的组织结构	(50)
第三节 天津商会的多层次组织网络	(71)
第四节 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外部环境因素	(90)
第五节 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内部运行机制	(108)

第三章 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性质和功能：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118)
第一节 区域市场交易成本与天津商会 组织网络的性质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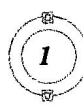
第二节	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天津商会 组织网络的功能·····	(139)
第四章	天津商会组织网络与区域商品市场互动 ···	(164)
第一节	区域商品市场结构整合与天津商会 组织网络·····	(166)
第二节	区域商品市场交易中介与天津商会 组织网络·····	(192)
第三节	区域市场商品流通与天津商会组织网络·····	(215)
第五章	天津商会组织网络与区域资本市场运行 ···	(245)
第一节	区域金融市场与天津商会组织网络·····	(246)
第二节	天津商会组织网络与区域产业资本投资·····	(280)
第六章	结 论 ······	(309)
一、	制度化、多层次的组织网络·····	(309)
二、	非市场组织的市场功能 ······	(312)
三、	结构二重性:组织网络与区域市场经济的互动·····	(315)
参考文献	·····	(319)
后 记	·····	(325)





第一章

导 论



中国近代商会制度确立于 20 世纪的最初十年,在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主要商埠均建立了商会组织,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商会已经存在了约半个世纪。1949 年后商会被改组为“中华工商联合会”,近代商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商会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传统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历史轨迹。

早在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有一些在华日本人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商会的活动进行考察,30 年代后少数国外学者的研究涉及商会,80 年代,近代商会成为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专题,90 年代以来国内近代商会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产生了一批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近年来,商会研究的内容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商会研究的领域也进一步扩展,一些研究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的突破,对商会史的研究乃至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尽管商会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研究的理论框架、视角、方法等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一、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历程

国内外对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国外的研究大致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则于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商会的